

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

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符合全球国际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 张仕荣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最复杂、最敏感的双边关系之一，自冷战结束以来可谓一波三折，但是体现了十足的韧性，两国的竞合态势已成常态化，而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令人瞩目。2017年4月6日至7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第一次握手，这次被媒体称为“习特会”的元首会晤取得圆满成功和丰硕成果，中美关系可谓：柳暗花明，正道沧桑！

（一）

特朗普带着一身的民粹色彩上台，表现了选民急于求变和厌倦现状的想法。从特朗普的演讲来看，关注国内事务是其主要施政目标，同时对外战略也服从和服务于国内经济振兴和民众福利及就业的改善。当前，特朗普的整体对外战略的成型尚需时日加以观察，包括美国庞大的同盟体系如何改革，特别是北约、日美同盟的走向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可以解决的，需要全面的衡量与筹划。而美俄关系的走向也不乐观，因为涉及整个欧洲的安全体系构建和美国的全球责任划分。总体看，美国多年来在全球揽了太多的事情，同时也背负着众多世界责任，如同一头公牛闯进瓷器店打碎琳琅满目的瓷器很容易，但是复原很难。而现行的国际秩序的塑造与美国的对外蓝图构建远比瓷器的烧造更加复杂和繁重。

同时，一个基本问题要厘清，改变不尽合理的制度可谓进取，颠覆来之不易的成果则是倒退。这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领域表现尤其突出。英国“硬脱欧”、特朗普当选都反映了逆全球化的问题，但是许多问题并非全球化的问题，而应归属于传统安全问题。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包括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只是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各国和人民都要过紧日子，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经济体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反全球化的呼声就会相对强烈。如何消解其负面作用，这是应对当前全球和各国经济困局的关键。一种是民粹化的趋势，不顾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规律和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基本趋势，将国内矛盾简单对外转嫁和输出，甚至通过军事遏制达到本国及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这是十分危险的，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都历历在目。另一种理性的做法则是苦炼内功，如中国认识到世界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一直强调将创

（上接1版）但也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因为强调中国特色而偏离现代大学制度的共同特征和共同要求，而应采取学习借鉴的兼容并包态度，认真分析、客观吸取一流大学建设的共性内容，力克盲目追捧西方教育思潮，模糊套用西方模式的不自信思维方式。同时，要注意防止过分强调中国国情，片面孤立地从中国传统甚至糟粕中寻求依据、抱残守缺，如官本位文化惯性下高浓度浓厚的行政化色彩问题。这些内容并不能构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合理内核，需要客观反思和甄别。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探索和创新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模式。长期以来，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紧密而复杂，在中外高校办学实践中一直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不受约束的大学自治是不存在的。我国的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政府主导、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需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政府干预与办学自主权之间保持平衡。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方式的

改革，一方面，应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合理划定政府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努力做到用权“授之有据、行之有规、错之有责”；另一方面，加快完善章程建设，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权力运行的自律机制，有效行使办学自主权。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一批有担当、能引领的校长。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大学校长的工作侧重各有不同。在起步发展阶段，其首要职责是建构体系、制定规则、保障大学的有效运转，严谨的学者型校长大有用武之地；而在发展提升阶段，则侧重于校长的战略谋划能力和综合改革能力，呼唤教育家校长的出现。因为政府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方式的变革，办学自主权的增加以及大学治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 with 更加紧迫的任务压力，更加强调治理方式的多元民主以及治理过程的规范透明。校长既要具有卓越的学术领导能力、全面的校情洞察能力、杰出的行政管理能力，还要兼具敏锐的统筹规划能力和开放的全球视野，来引领大学主动适应和服务社会发展。简

新作为引领本国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敢于创新、勇于变革，例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对于如此复杂和棘手的全球政治经济的综合性问题，需要特朗普团队全面消化并且有的放矢施策，才能体现美国真正的领导力和大国责任，简单将美国经济问题归咎于中美贸易失衡与中方责任无疑是南辕北辙，甚至是饮鸩止渴。

（二）

当前，中美关系始终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主线，可谓纲举目张。2017年2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特朗普在通话中特别强调，他充分理解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高度重要性，并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习近平主席对此举表示了高度赞赏，并表示“一个中国”政策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两位领导人的这一通话使得因台湾问题一度较为紧张的中美关系又回归正常轨道。

按照美国历届总统执政低开高走的规律，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团队甫一上台还应该有一个学习过程，但是其学习曲线是否能够平滑向下，体现其学习效率尚未可知。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尤其是美国对外战略的经验沉淀需要扬弃式继承和开拓性思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就是扬弃了美苏的冷战零和博弈状态，这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强烈的反共情结，声称要“把马列主义抛弃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里根上台后却很快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最终“八一七公报”的签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邓小平在同里根会谈时说，中美两国虽然前一段时间吵了一些架，但近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好的。他说，中美两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点，但也有分歧点。中美两国都有发展合作的愿望。华盛顿的有关中国问题专家指出，里根并不是对中国最友善的美国总统，但他在任内，开启了美中都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新关系，而他处理台海问题的方式，也成为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依据的准则。虽然当年苏联威胁是中美形成紧密关系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今天中美关系更加具有相互依存的特征，一旦彼此对抗必将是人所共知的完全双输的局面，而对抗的主体责任无疑在美方。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个“合力”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构成，并非是按单个人或少部分

人的意志所臆造的历史。当前美国国内保守势力抬头，国力仍然超强，因此本世纪初期前20年还是美国建立其主导的“单极世界”的“窗口期”，中长期内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会有新的表现且呈上扬态势。但是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世界多极化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国家集团的综合国力在冷战后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并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相应地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早在20世纪末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王缉思就指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美国虽然仍将领先于世界，却是孤立的，是无力称霸世界的，“高处不胜寒”可以作为美国地位的形象写照。

（三）

如何看待发展中的中国？这是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核心任务，并且决定中美关系的走向。事实上，中国在“一超多强”中的表现最为抢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外资超过1.7万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2万亿美元。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均在30%以上。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了亿人次。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各个经济体目前呈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蛋糕”，无法想象哪个国家会缺席这场共享的盛宴。

特朗普团队的共和党执政理念必然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其核心要旨。而中美博弈时中国可打的牌越来越多，中美两国需要更多的协商共事而非零和博弈，这是当今国际政治学界的共识。

在“习特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而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

就发展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归纳主要有三点：一是要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方向，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二是积极拓展务实合作，追求双赢、多赢，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三是坚持建设性管控敏感问题，相互尊重、避免误判、多作换位思考，防止矛盾升级。

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这些有益的经验总结需要特朗普团队仔细学习和研判，以避免犯下低级乃至颠覆性的错误。总之，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符合全球国际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大国关系

“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法国右翼政党崛起，当前，西方出现了一波反全球化浪潮。这一现象凸显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加剧，并产生外溢效应。认识和理解“反全球化”的实质，对于我们趋利避害、顺势而为，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反全球化现象难改全球化趋势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

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超过预期减半的目标。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阶层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境遇改善说明经济全球化整体上是有益的。在全球财富迅速扩张的同时，国际间的合作机制也空前提高。1992年，旨在推动资本自由流通，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签署。1999年欧洲统一货币欧元诞生。1995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正式成立。跨区域经济合作步伐也逐渐加快，1995年至今全球跨区域经济合作FTA从38项已增加到282项。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着世界前进的方向，全球化本身没有错，反全球化问题的核心是全球治理机制的失灵。全球治理失灵指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伴随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权力转移日益明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许多新问题、新情况，需要用新方法、新思路来解决。然而，总体上看，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却严重滞后，用国际关系的老方法解决全球治理的新问题，常常会表现出无能为力、治标不治本的局面。

全球化是趋势，反全球化是现象，反全球化实质是平行层面的全球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网络安全等新挑战，很难依靠个别国家独立解决。关键是要正面对导，化害为利，加速全球治理体系改良，在危机中探索建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

警惕反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作为一种思潮，反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有益于促进反思，并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建设，最终实现全球化的长期健康发展。然而，反全球化在认识上有片面性，容易导致一些国家政府和民众回归孤立，走向保守。

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西方对于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全球治理的最早构建者。然而，也须看到，在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通过其资本、技术优势确立经济优势，而且通过国际制度建设，把自身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通过推销西方价值观确立自身的观念优

势，目的是长久保持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西方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15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8.7%降至56.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比则由19.0%上升至39.2%。这一巨大变化，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惜开历史倒车，采取反全球化政策，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从2008年到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歧视性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在美国的“带领”下，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资料库，2015年各国实施的歧视性贸易措施，比2014年增加50%，而中国是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伤害最重的国家。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下，全球贸易已经跌入10年来的低谷。

二是规则修正主义。自1648年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开创以来，“国家利益至上”一直被西方国际关系奉为主臬。国际规则本质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为了应对国际气候变化，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为借口，全然不顾国际责任，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在经贸领域，为了保持自己在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多次强调要抛开WTO制定规则，为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立标定规则，以此保障美国的经济繁荣。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直言不讳，“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应该制定这些规则”。

三是政治孤立主义。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一战、二战前后，美国国内都曾出现过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孤立主义思潮近年在美国再度涌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一书中，完整阐述了美国应减少国际义务，放弃扮演“世界警察”所担负的责任，专注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观点。一方面，美国减少国际干预，为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构建提供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如同美国不负责任的干预一样，美国不负责任地收缩，也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地区冲突升级、恐怖主义蔓延等问题，给世界带来新的威胁。

主动谋划引领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15.5%；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出口市场份额升至13.4%，并成为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伴随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需求都大大增强。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

难改全球化发展趋势

反全球化

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尽管目前的全球化遇到明显的挫折和挑战，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治理进程不会中断。解决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只能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予以解决。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学习中补齐经验短板，发挥引领作用。

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已经签署12个双边FTA及一个升级协议，并正在谈判8个双边和区域FTA。中国倡导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在反全球化声浪之中，“一带一路”不仅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也开启了世界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

总的来看，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就如孪生兄弟，形影不离。全球化的活力来源于竞争，而竞争必须建立在差异上。有差异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在差异中寻找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必须通过国家干预，使国内社会的差异形成积极的竞争，而非绝望的对抗。“历史没有终结”，全球化进程仍将继续。深入理解反全球化现象对于我们把握世界大势、完善全球治理，积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全球化赋予新的生命与活力，打造公平公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上接1版）但也不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因为强调中国特色而偏离现代大学制度的共同特征和共同要求，而应采取学习借鉴的兼容并包态度，认真分析、客观吸取一流大学建设的共性内容，力克盲目追捧西方教育思潮，模糊套用西方模式的不自信思维方式。同时，要注意防止过分强调中国国情，片面孤立地从中国传统甚至糟粕中寻求依据、抱残守缺，如官本位文化惯性下高浓度浓厚的行政化色彩问题。这些内容并不能构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合理内核，需要客观反思和甄别。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探索和创新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模式。长期以来，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紧密而复杂，在中外高校办学实践中一直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不受约束的大学自治是不存在的。我国的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政府主导、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需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政府干预与办学自主权之间保持平衡。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方式的

言之，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必须要实现从学者型校长向教育家校长的转变。这是把握历史机遇、深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守望大学精神和引领社会前进的需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需要富有教育理想、创新精神和懂政治的教育家校长为大学的学科、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进行战略思考和战略谋划，更需要具有坚定意志和大无畏精神的教育家校长统筹把握、综合施策，全面推进大学的综合改革，助力中国大学的世界崛起。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实现大学内部治理的现代化。目前，我国的大学制度仍处在探索、完善和优化过程中。构建以大学章程为基础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亟待完成和总结提升的重要任务。一方面，需要在大学内部权力运行中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责范围，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和组织构架，形成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另一方面，院系是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是学术

研究和知识创造的大本营。要真正落实学术权力，必须扩大院系自主权，降低管理重心，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简言之，就是在大学领导层与基层学术组织之间进行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以保障院系自主权和学者的学术活力。

加快塑造独创性的中国大学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是人类先进思想的集散地。大学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更是一个精神的存在，是一个高度自觉的文化组织。它是社会的灯塔，是知识创造的园地，是人类文化传承创新的家园。大学文化本质上具有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引领人的重要作用，是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展现，是一所大学最鲜明的特色、最宝贵的财富和最重要的软实力。在多元文化并存、多元价值观交流碰撞的当代社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高度重视和同步涵育具有中国风格和

中国气派的大学文化，用富于中国特色、时代气息和鲜明个性的大学文化培育兼具科学理性和人文情怀的新人，激励为国为民、奋发图强、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动力，引领社会文化前进的新方向。

首先，中国的大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既要立足传统，融合中西，也要坚守大学精神，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主动适应世界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趋势，不断丰富和发展大学文化内涵，最终实现大学文化有效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其次，中国的大学文化建设必须以大学精神的建构为核心，将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等构成现代大学独精神品质的要素真实融入到校风、教风、学风以及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的方方面面，并使师生明确大学的使命与担当，成为大学精神的自觉践行者与传播者，进而树立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师德先行，特别是在功利价值观导向和学术批评缺位的当

下，大学应将师德师风、学术道德、学术创新作为大学文化建设和学术精神重塑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再次，中国的大学文化建设必须走特色发展之路。世界一流大学往往因其独具的个性特色和文化遗产而成就其卓越。大学文化的个性与特色代表了大学与众不同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而不同文化熏陶培养的毕业生，必然带有强烈的本校文化印记。大学应对自身办学理念、教风学风、学科建设等问题形成高度的文化自省，加快特色文化的孕育和积淀，主动凝练和彰显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风格。千校一面的大学文化折射出当前大学文化建设的薄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中国的大学文化建设既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办学理念、制度文化等内容中赋予更加丰富的中国元素，也要主动承担起中国文化领跑世界文化的重任，成为思想和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切实履行大学传承创新文化的功能，促进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员，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